

东方文学研究 集刊(2)

李勇林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 办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

王邦维 主 编
王向远 副主编

比较视野中的 东方文学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视野中的东方文学/王邦维主编.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378-2826-1

I. 比... II. 王... III. 文学研究—东方国家—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5648 号

比较视野中的东方文学

王邦维 主 编

王向远 副主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www.bywy.com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78 千字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78-2826-1

I·2760 定价: 20.00 元

比较视野中的 东方文学

顾 问：季羨林
严绍璿
何乃英

主 编：王邦维
副主编：王向远
编委会：王向远
王邦维
王 燕
李 强
孟昭毅
陈春香
陈岗龙
张玉安
魏丽明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是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中心现出版有《东方文学研究集刊》(暂定文丛)和《东方文学研究通讯》(季刊，内部发行)。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成立于1983年，是全国性的东方文学和东方比较文学学术团体，会员来自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相关人员。

本书的出版得到山西大学文学院的资助，谨此致谢。

综 论

- 东方文学研究在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文学的基本走向及特点

专题研究

- 日本歌舞伎的叙事分析
简析泰戈尔的思想
菲律宾芒扬族阿拉安部族原住民的洪水神话
——对阿拉安-芒扬人的初次田野调查
回鹘文《五卷书》译本及相关问题研究

比较研究

- 中国文学与缅甸文学
印度味论诗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
“日本桥”与中国现代艺术思潮观
日本古代文学与汉文化的关联及其民族特色
泰戈尔诗学理论与闻一多诗论
——一个“反影响”研究的实例
“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述评
林语堂与佛教
万变不离其宗
——亚洲罗摩故事文本比较研究
蛇鼠、藏宝、掘宝秘诀与佛经故事
——中国古代掘宝母题动植物功能的
跨文化探源
禅“空”与金斯伯格诗作
中越近文化的诗学比较
略论莎士比亚与圣经的关系

作家作品研究

- 走进《沉船》的宗教世界

何乃英/3

王向远/12

孟昭毅/27

张绍斌/36

史 阳/46

杨富学/60

李 谋/77

裴晓睿/87

卢铁澎/99

陈春香/112

于奎战/121

张 娟/135

赵怀俊/145

张玉安/157

王 立/171

秦 琰/183

赵玉兰/195

梁 工/206

张 莉/219

目 录





“我的宗教在贫乏的人世间,体现在妇女形象上”

——论泰戈尔戏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杨玉珍/229

英语面具 印度灵魂

——解读 R·K·纳拉扬的作品《斯瓦米和
朋友们》

王春景/238

走东西结合之路

——试论川端康成后期小说的创作方法

何乃英/249

村上春树小说的特色

——同其他日本小说的比较

林少华/261

日本传统文学视野中的村上春树

高文惠/271

伸子与露莎们的女性意识

牛水莲/282

论野间宏的转向体验与战争体验小说

刘炳范/291

想象中国古典,抒写人生理想

——论芥川龙之介的中国题材作品群

李秀卿/303

沦陷时期章克标的文学活动及其民族认同

陈 言/314

编后语

王邦维/327



综论

东方文学研究在中国

何乃英

从 20 世纪 10 年代算起, 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至今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这 80 多年的历史, 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19~1949 年为起步阶段, 1949~1978 年为发展阶段, 1978 年至现在为繁荣阶段。

一

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 掀开了我国社会历史新的一页, 同时也掀开了我国文化历史和文学历史新的一页。我国翻译出版和评论研究东方文学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正式迈出第一步的。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49 年新中国诞生的 30 年间, 可以称为起步阶段。这个阶段我们所进行的工作, 一是翻译和出版东方文学, 二是评论和研究东方文学。

据不完全统计, 这个阶段总共翻译出版了 170 多部东方文学作品, 其中以日本文学作品最多, 共 140 多部, 占 82%; 印度文学作品次之, 共 20 多部, 占 12%; 此外朝鲜、伊朗、希伯来和阿拉伯文学作品不足 10 部, 占 6%。从这个统计数字可以看出, 这时翻译出版的东方文学作品所涉及国家和地区不多, 只是东方的一小部分。至于日本文学作品为什么会受到特殊优待, 其原因恐怕与以下两

点有关系：一是因为日本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比我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开展得早，日本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在短时间内所取得的巨大变化，引起我国当时要求改革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二是因为中国有很多从事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人士曾经是日本留学生，他们在日本生活和学习过，了解日本文学，懂得日本语言，翻译介绍日本文学作品得心应手。

不过，尽管这个阶段我国翻译出版的东方文学作品是很有限的，并且存在着不少缺点，但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看到，在这时还产生了若干部堪称精品的译本，如鲁迅译的夏目漱石、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和芥川龙之介的作品，郭沫若译的海亚姆的《鲁拜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新月集》和《飞鸟集》，谢冰心译的纪伯伦的《先知》等便是。这些译者都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大家，凭着非同寻常的文学才华，凭着对于原作者和原作品的深入理解，凭着高超的中文水平和外文水平，才能产生这些精品。

这个阶段在评论和研究东方文学方面的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译本的序跋和论文。这时发表的序跋和论文虽然数量不算很多，但也有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值得我们后人仔细揣摩。二是作家传记。郑振铎的《泰戈尔传》可以说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有重要价值的东方作家传记。三是国别文学史，包括日本文学史和印度文学史在内。

但这时最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当推郑振铎著《文学大纲》。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世界文学史，而且是真正将西方文学、东方文学和中国文学全部包容在内的世界文学史。仅就东方文学而言，这部著作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体上确立了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具体地论述了东方文学中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

还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个阶段，无论是在翻译出版东方文学方面，还是在评论研究东方文学方面，都表现出不同思想和不同倾向的矛盾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以鲁迅、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为代

表的进步作家,努力介绍东方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以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的前进,促进我国新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我国历史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也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可以归纳为翻译出版、评论研究和培养人才等三个方面。这是一个富有成果、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

在翻译出版东方文学方面,这个阶段比上个阶段有了很大的进步。一是翻译出版的数量增加,领域扩大。据不完全统计,这个阶段翻译出版东方文学的总量比上个阶段增加一倍以上,而翻译出版日本以外的其他东方国家文学的数量则比上个阶段增加10倍以上。与此同时,翻译出版东方文学的领域,无论是从国家来说,还是从作家来说,都有了很大的扩展。二是翻译出版的质量不断提高。质量提高的表现,一方面是随着中国学者掌握东方国家语言文字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经第二种外国语言文字转译的现象逐渐减少,直接从原文翻译的作品逐渐增多,这是使译文更加忠实可靠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是译者的翻译态度更加严肃认真,力求精益求精,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使译文流畅,容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因此,这个阶段我们翻译出版的堪称精品的作品较之上个阶段有大幅度的增加,如季羨林译的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寓言故事集《五卷书》,金克木译的迦梨陀娑的《云使》,吴晓铃译的首陀罗迦的《小泥车》和戒日王的《龙喜记》,谢冰心译的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和《诗选》,石真译的泰戈尔的《故事诗集》等便是。

在评论研究东方文学方面,这个阶段比上个阶段也有不小的进步。在译本的序跋方面,数量多达数百篇,其中材料比较翔实、分析比较透彻、观点比较正确的并不少见,如季羨林写的《沙恭达

罗》、《优哩婆湿》和《五卷书》译本序,吴晓铃写的《小泥车》和《龙喜记》译本序,刘振瀛写的《二叶亭四迷小说集》、《夏目漱石选集》和《樋口一叶选集》译本序等,这类序跋不但能够起到正确引导读者阅读欣赏的目的,而且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在学术论文方面,也有百余篇之多,其中包括若干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达到一定高度和深度的文章,如季羨林的《纪念印度古代伟大的诗人迦梨陀婆》和《〈十王子传〉浅论》,金克木的《关于印度诗人迦梨陀婆》,刘振瀛的《夏目漱石艺术书简》,黄轶球的《阮攸和他的〈金云翘传〉》等。这个阶段出版的国别文学史不多,似乎只有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一部,但这部书却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大大地超过了上个阶段的同类著作。该书作者是中国屈指可数的梵语学者之一,长期从事梵语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梵语文学史》便是他教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成果。这部书的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完整的梵语文学史体系,二是对梵语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评析。

在培养东方文学人才方面,这个阶段也有很大的突破,即在大学强化东方文学的有关专业,并在中文系开设东方文学的有关课程。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大学已经设立东方语言文学系;新中国成立后,这个系的力量不断加强,专业设置不断完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成为中国培养东方语言文学研究人才的主要基地。从1958年起,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辽宁大学等十几所大学又率先在中文系开设东方文学课程,作为外国文学课程的一部分,从而打破了以外国文学为名、西方文学为实的不合理局面。我们应当看到,在大学设立东方文学有关专业和开设东方文学有关课程,对于推动东方文学研究工作起了很大作用。首先是培养了一批东方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人才;其次是促进了东方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工作。

在这个阶段,我国广大的东方文学研究人员都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东方文学;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以上的成绩,也正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分不开的。不过,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极

“左”思潮对于东方文学研究工作的干扰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极“左”思潮走向极端,使东方文学的研究工作陷入了瘫痪状态。

三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波折,从1978年起,我国的社会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与此同时,我国的东方文学研究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繁荣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的东方文学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可谓百花齐放,春色满园。

在翻译出版东方文学方面,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个阶段数量猛增,质量也进一步提高。这时,除了一批资深的老译者继续活跃以外,又有一大批中青年译者脱颖而出,逐步成为东方文学翻译界的生力军。同时,出版东方文学的出版社也从北京和上海的两家扩展到全国各地的许多家。因此,这个阶段东方文学作品的出版数量比上个阶段成倍、成十倍地增长。以日本文学为例,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共约翻译出版60余部,而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间,共约翻译出版600余部,增加了10倍左右。这个阶段东方文学翻译出版质量的提高,既表现在译文上,也表现在计划性和系统性上。前者是指许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丝不苟,努力提高译文水平。特别是老一代翻译家,推出了更多的精品,如季羨林译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纳训译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刘振瀛译的夏目漱石小说等。后者是指不少出版社改变“抓一部译一部”的无序状态,有意识地加强了出版的计划性和系统性,集中力量出版了许多有分量、有水平的作品。

在评论研究东方文学方面,这个阶段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无论是序跋论文、专题论著,还是国别文学史、东方文学史,都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比前两个阶段有长足的进展。由于出版事业蓬勃发展 and 报纸杂志迅速增多,译本序跋和学术论文的数量比上个阶段成

倍、成十倍、甚至成几十倍地增长,总数达数千篇之多。与此同时,这些序跋和论文的质量也在日益提高,涌现出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时出版了若干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专题论著,如季羨林的《〈罗摩衍那〉初探》、黄宝生的《印度古典诗学》、叶渭渠的《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朱维之的《圣经文学 12 讲》、郅溥浩的《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等。这时还出版了为数相当可观的国别文学史,如叶渭渠的《日本文学思潮史》、韦旭升的《朝鲜文学史》、季羨林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刘安武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等。经过前两个阶段的酝酿和准备,这时还出版了一系列东方文学史著作,如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季羨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高慧勤和栾文华主编的《东方现代文学史》等,这是我国的东方文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是从孤立的、片断的、分散的研究进入全面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的重要标志。此外,何乃英主编的《东方文学概论》则试图探索有关东方文学的若干理论问题和关系问题。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阶段取得以上的辉煌成绩,除了有前两个阶段工作的基础之外,主要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解放了思想,一个是扩大了队伍。在解放思想方面,广大学者排除了极“左”思潮的干扰,抛弃了各种框框,开阔了眼界,增强了信心,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力求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东方文学。在扩大队伍方面,首先是大学的东方文学教学阵地增加了,其次是设立了许多东方文学研究机构,第三是建立了许多东方文学研究学会。

我想在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东方文学分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研究组织,拥有会员 100 余人。他们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各高等学校中文系(文学院)从事东方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教师,另一部分是各高等学校外语系(外语学院)和研究机构从事东方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1983 年 8 月,东方文学分会(起初称为“全国高等学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在四川乐山正式宣告成立,同时召开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从此以后,我国的东方文学工作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大家可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彼此交流,取长补短。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这个组织确实对我国的东方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特别是高等学校的东方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东方文学分会先后在 1983 年至 2004 年间成功地召开了 11 次学术研讨会,并且成功地举办了两届研讨班,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高等学校纷纷在本科开设东方文学课程,招收东方文学方向的研究生,许多出版社陆续推出各种各样的东方文学作品、教材和研究著作,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四

最后还应当特别谈谈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东方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动向,产生的一系列新成果。笔者以为,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翻译出版东方重点作家全集,全面展示东方重点作家面貌;二是编著出版东方各国文学史,深入探讨东方各国文学发展规律;三是编著出版东方文学学术专著,深入研究重点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四是编著出版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专著,开拓东方文学研究的新天地。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东方文学研究起步较晚,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在翻译出版方面也是如此。以前我国翻译出版的东方重点作家作品,大多是规模不等的选集,很少翻译出版全集。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似乎只有在上世纪 90 年代翻译出版了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全集;其他有些作家的作品翻译出版的比较多,如日本的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印度的泰戈尔、普列姆昌德,阿拉伯的马哈福兹等,但也仅仅是他们作品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跨入新世纪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刘安武等主编的《泰戈尔全集》和张鸿年等翻译的《波斯经典文库》的相继翻译出版,便是可喜的新成果,前者是一

位作家的全集,后者是六位诗人的全集。

上个世纪我国出版了一些东方国家的国别文学史,但数量比较少,范围比较小,主要限于日本、印度等几个国家,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翻译外国学者写的著作。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先后出版了好几部国别文学史,其范围不再限于日本、印度等国家,其作者也不再限于外国学者。如叶渭渠、唐月梅的《日本文学史》,史习成的《蒙古国现代文学》,张鸿年的《波斯文学史》,梁立基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仲跻昆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金柄珉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等。这些文学史著作全面地叙述了各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深入地探讨了各国文学的发展规律。

我国学者在上个世纪已经编著出版了若干部有价值的东方文学学术专著,深入研究重点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进入新世纪以后,又有不少这个方面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如刘安武的《印度两大史诗研究》,唐仁虎等的《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穆宏燕的《凤凰再生——伊朗现代新诗研究》等,有的是对重点作品的研究成果,有的是对重点作家的研究成果,有的是对一个历史阶段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东方文学研究就在传统的研究方法之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方法,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是比较研究的方法。不言而喻,这种方法的形成和扩大,是与当时我国比较文学的迅速兴起和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无数事实证明,比较研究的方法的确能够拓宽东方文学研究的视野,扩大东方文学研究的领域,促进东方文学研究的深入,提出许多过去东方文学研究没有想到的问题,使得东方文学的情况、面貌、特点和规律更加清晰,并且能够充分发挥东方文学研究各方面人才的特长。进入新世纪后,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得到更加蓬勃的发展。其表现之一是,出版了许多东方文学比较研究的专著,如梁立基、李谋主编的《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王向远的《20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孟昭毅的《东方文学交流史》,王晓平的《亚洲汉文学》,郁龙余的《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薛克翘的《中印文学比较》,刘安武的《印

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张哲俊的《东亚比较文学导论》，陈岗龙的《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张朝柯的《〈圣经〉与希伯来民间文学》等。其表现之二是，许多学术研讨会都以比较研究为中心议题，如 2002 年 11 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召开的“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东方文学学术研讨会”，2003 年 10 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召开的“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2004 年 8 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和山西大学文学院联合召开的“东方文学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等。“东方文学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与会学者 60 余人，提交论文 40 余篇，本书便是这次研讨会的论文汇集。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